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与时俱进

ON EDUCATION KEEPING UP
WITH THE PACE OF THE TIME

论教育

段志坚◎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与时俱进论教育 / 段志坚著. —2 版.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7.6

ISBN 978-7-5357-4954-3

I. 与… II. 段… III. 高等教育: 职业教育—研究—中国—文集 IV. G71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80832 号

与时俱进论教育

著 者: 段志坚

责任编辑: 贾平静

出版发行: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社 址: 长沙市湘雅路 276 号

<http://www.hnstp.com>

印 刷: 湖南省教育印刷厂

(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厂联系)

厂 址: 长沙市青园路 503 号

邮 编: 410004

出版日期: 2007 年 6 月第 1 版第 2 次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70000

书 号: ISBN 978-7-5357-4954-3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文字苦海”的历练

——说说我自己和我的这本小册子

现在出书有一种时尚，请名家或高层领导作序，其好处是可以通过专家点评或领导首肯，扩大影响。开始我也有这种想法，后来是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一句话触动了我，他说：“要记住，你生活在人们中间。你不是你自己所想的那样，而是别人认为的那样。如果你自以为很了不起，而别人却认为你微不足道，那你就是微不足道的。”请一个、两个专家或领导“美言”几句，也只是一家之言，未必能代表“人们”。一个人怎么样，一本书怎么样，是一种客观存在，要让“人们”去评说，让历史去检验。基于这种想法，我选择了自序。自序的好处是和盘托出，由人评说。

先说说我自己。

再过几年，我就要退休了。可以说，我这一辈子都交给了教育，交给了文字。1975年元月从湖南师范学院（现为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在当

时被称为“工农兵学员”的我就迈进了教育的门槛。先是被分到湖南省小学教师辅导部,该部挂靠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人事关系也在该校。按照学校领导的考虑,先到实践中锻炼,于是被安排到一个班担任班主任。随即就带领学生下到长沙县高塘岭(现属望城县)附近的一个生产队进行劳动锻炼,大约不到一个月便被召回,调入湖南省教育局(后改称湖南省教育委员会,现为湖南省教育厅)办公室所属《湖南教育》杂志编辑部。除毕业前夕上过两堂实习课外,还没有真正站过一天讲台的我,就这样结束了教师生涯,并从此与文字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前,在湖南师范学院担任过近一年的专职院报编辑)。在《湖南教育》编辑部一干就是14年,1982年获编辑职称,1984年担任编辑部主任,并在《中国教育报》创办初期,担任了6年的兼职记者。在此期间,我写了大量的教育新闻报道,宣传了一批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先进典型。如,撰写了长篇通讯《崇高的献身精神——记山区女教师覃申媛》,《中国教育报》刊出后,《人民日报》即予转载,《新华文摘》收录,省委、省政府作出了《关于开展向覃申媛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组织并撰写了对桃江县、郴县教育工作的连续报道,引起了省委、省政府和原国家教委的重视,后来分别在两地召开了现场工作会。同时,编发和撰写了一批有影响的文稿。如,编辑了全国著名心理学教授邵瑞珍撰写的《布鲁纳教学思想浅介》,作者看后来信称赞:“《布鲁纳教学思想浅介》一稿改得极好”;采访了全国著名教育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陈元晖,整理了一篇题为《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陈元晖同志同记者的谈话》,刊出后即被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全文复印,《光明日报》摘发了其中一节;与全国著名翻译家、华东师范大学杜殿坤教授合作系统介绍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撰写了《毛泽东教育思想是社会主义教育的指导思想》,对毛泽东教育思想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和科学的评价,在《新湘评论》刊发后,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全文复印。在《湖南教

育》编辑部工作期间,还经常被抽调到厅里为全省性的教育工作会议组织和修改典型材料,起草文件和领导讲话稿。从1979年“桃江会议”(这年11月6日,中共中央向全国批转了《湖南省桃江县发展农村教育的情况报告》,紧接着,原教育部和中共湖南省委联合在桃江召开教育工作现场经验交流会)到2002年12月我离开教育厅,大凡全省性的重要教育会议,几乎都有我的材料任务。每天与文字和标点符号打交道,一直处在“文字苦海”之中。

1989年6月调省政府科教办调研处,先后任副处级研究员、副处长,主要工作是搞调研,起草有关文件,为分管教、科、文、卫、体和环保工作的、时任省委常委、副省长王向天起草讲话稿,我从一个“苦海”掉进了另一个“苦海”,而且更苦,常常通宵达旦地“爬格子”。

1991年9月,省政府科教办撤销,我转到中共湖南省高校工委工作过一段时间,工作性质没有变。1992年2月调回省教委。心想,这回可以脱离“苦海”了吧,然而领导却认为我做政研室的工作最合适。政研室的工作还是那些事,写材料,起草文件和讲话稿。谁叫你是编辑出身呢,也许我就是这样的命。于是被安排到政研室担任副主任、正处级研究员,同时还担任省教委主办的《教育政策法规研究》杂志的副主编,旧业重操,“苦海无边”。在政研室整整工作了四年,其间还参与了王向天、龙禹贤(原省政协副主席)、冯象钦(原省教委党组书记、副主任)主编的《走自己的路——湖南农村教育改革14年的探索》一书的写作,全书六个章节,我写了关于“职业教育”和“经费筹措”两个章节。1996年4月,省教委机构改革,干部换岗,好不容易转到职教处,先后任副处长、处长之职。机关工作,一是调研,二是发文,三是开会,文字任务也不少。我曾经多次对我的同事和朋友说:“我要远离文字。”过去是帮别人做事(当然这是工作),现在是自己手上的事,远离得了吗?“别人的事”照样还得

做,领导之命,朋友之请,躲也躲不了。在职教处工作期间,我还兼任了省教育厅主办的《职业与技术》杂志的总编。我是职教处长,当然想把这本刊物办好,利用它来宣传职业教育,指导和推动全省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每期我都要和编辑部的同志一起搞策划,清样出来后,还要一篇一篇地认真审读。

2002年9月17日,中共湖南省委发出任职通知,我被派到湖南科技职业学院担任党委书记。此前,有不少朋友劝我,你在机关工作了这么多年(近28年),又上了年纪,还到学校去什么,学校工作既具体,又辛苦,责任也大。当然,他们都是好心。这一次,我没有犹豫,我要到学校去,一是想“远离文字”,当然这不是主要的;二是想干点事,按自己的想法干点事,是事业心、成就感和责任感的驱动。谁知,到了学校,文字的任务也不见少,要出台机构改革方案,制定学校发展规划,建立各种规章制度,各种各样的活动,经常要出席讲话,不时还有老师走来,送上一篇文章,说:“请您指点指点。”我还管了学报和院报,并且主持三个课题的研究,两个国家级的,一个省级的。文字啊,文字,我恐怕一辈子都“远离”不了啦。

说说自己,是为了说说我的这本小册子。在生命和精力最旺盛的时候,我都是做着“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工作,经我处理或撰写而又不属于我自己的东西,恐怕不下千万字。我也很想写点属于我自己的东西,但是没办法写。一是已经写得很累了,实在累不起;二是你的“布料”都给了人家,还有多少东西可写呢?写了一辈子的文字,而没有给自己留下一点东西,临到退休了,总感到有些遗憾。有好几位朋友对我说,你写了那么多东西,汇编起来出本书吧。在朋友的撺掇下,我真的动了心。天哪,我翻箱倒柜地找,也找不出几篇拿得出手的東西。好在我到学校这两年为了课题研究的需要写了几篇东西,凑在一起才有了这本小册子,这就是“小”的原因。

文字工作虽苦,但也历练了我。一是促进了我的学习,二是促

进了我的研究,锻炼了我的思维。世界在变化,中国在变化,新的思想,新的精神,新的事物层出不穷,要写东西,就要学习,你那点老本早就没有了,不学习,就连一天都撑不下去。因此,从参加工作起,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读报不过夜,再晚也要把当天手头的报纸读完。光读报还不行,你还得围绕你要写的东西去学习,并且要经常留心积累不知哪天要用得上的资料。尽管这样,常有“江郎才尽”之感,有时就像被逼进了一个死胡同。要写东西,就要不停地思考。有时“卡了壳”,吃饭想,走路想,睡觉想,甚至上厕所也想。我还真的常有如厕时解决“卡壳”的事。大概只有这个时候才是最“放松”的时候了。文字工作之辛苦是不搞文字工作的人难以想象得到的。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提到两个人,他们对我的成长和成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位是唐仲扬(原湖南教育报刊社党委书记、社长、编审),是他把我领进了《湖南教育》编辑部的门(后来我才知道,在我毕业前夕,他到湖南师范学院去物色人,因我在院报工作过,当时院报主编杨布生老师把我推荐给了他。因当时机关不能直接进入,放到第一师范只是一个过渡)。当时长沙正在放阿尔巴尼亚的一部电影,叫《第八个铜像》,编辑部已有七个人,加上我,就是“第八个铜像”了。到了编辑部,经常是由老唐带着我下去采访,我写的稿子大都是他修改的。怎么采访,怎么构思,怎么选材,怎么加工提炼,如果单从写文章的角度讲,我从他身上学到的东西,要比学校学到的东西多得多。现在他已经退休了,我常怀感激之情,依然十分敬重他。

另一位是王向天。进入省教育局的第二年,组织上就安排我去农业学大寨工作队,下到湘西自治州吉首一个偏远的山乡。当时向天同志是高教处的处长,担任工作队队长,我在队里担任秘书工作。应该说,我和向天同志的接触是很早的。后来他当了厅长,又当

了省委宣传部部长、副省长,把我调到省政府科教办,就是他要去。在科教办期间,我经常跟随他下去调查,参与与他工作相关的各种文件与讲话的讨论和起草。向天同志的工作特点是:求实、创新、认真。每发一个文件,或作一个讲话,事先他都亲自调查研究一番,或找几个人来座谈一下。他说,领导干部一定要在知识分子中交几个有真知灼见、能讲真话的朋友。要给高校的领导作报告,他就把他的几个知心朋友找来谈一谈,冯象钦、唐凯麟、谭双泉、刘忠良、李时中经常是他的座上客。他在调查中发现,每个地市都有一个师专、一所教育学院,有的就一墙之隔;每个乡都有一个教育办,要养好几个人,教育经费又那么紧张,就提出要把师专和教育学院合起来,把教育办并到乡中学去。当时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因为他坚持了实事求是。他思维敏锐,知识底子厚,每次讲话、作报告,都力求有点新思想、新见解、新语言。1990年3月,省政府在岳阳市召开全省血防工作会议,他在讲话中谈到领导者的责任时,先引用了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一句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接着又朗诵了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在山东潍县当县官时写的一首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然后他说:“在社会主义的今天,作为执政的共产党的干部,应该比范仲淹、郑板桥有更宽阔的襟怀和更高尚的情操,不能止于先天下忧,而要以解天下忧为己任。”“群众的疾病就是领导的心病,共产党人要以解天下忧为己任”,这句话成了他这次讲话的最为闪光的一个亮点。1991年2月,他在全省体育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发展湖南竞技体育的“女、小、轻、巧、水”的五字方针,强调要从湖南的实际出发,扬长避短,突出重点。他说,任何一个方面的工作要上去,都离不开六个字:路子、班子、票子。路子是第一位的,路子对头,事半功倍;路子不对,事倍功半。1990年4月,向天同志在全省环境保护会议上讲

话,为了引起大家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向天同志在摆了一连串环境污染的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之后,重点讲湘江。他说,湖南之所以简称“湘”,就是因为有这样一条哺育了世世代代湖南人民的母亲之河。现在湘江情况怎样呢?他从源头的永州,讲到衡阳、株洲,讲到湘潭、长沙,讲到水至江尾的岳阳,然后一句话打住:“可以说是两岸浓烟禁不住,一江浊水向东流。”接着引用白居易《忆江南》词句:“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然后说,如今却成了这等模样,情况不可谓不严重了。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深深忧虑吗?难道我们还能够以这条理由那条理由来推迟、耽误对湘江的治理吗?最后两个反问,令人振聋发聩。说到认真,真让人由衷佩服。每回草稿出来后,他都要找几个人坐在一起,一段一段地过,一句一句地过,一字一字地推敲。过了一遍不行,还要过第二遍、第三遍。还有这种情况,稿子过了之后,大家都认为不错,可以松一口气了。谁知道,第二天他一觉醒来,说,“不行,推倒重来。”于是又重新“砌炉灶”。自然,这后一稿比前一稿是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向天同志逝世后,龙禹贤、冯象钦、蒋作斌(原省教育厅厅长)几位领导说要给他出个文集,取个什么书名好呢?讨论时,我发表了一个意见:能不能叫“求实与创新”,大家琢磨了一下,认为反映了他的工作和思维的特点,后来就用了这个书名。何东昌同志在扉页上的题词是:“新时期教育的一位出色的开拓者的思索”,对文集作了精当的评价。

在向天同志身边工作的两年多里,我不仅在文字方面得到进一步的磨炼,更重要的是学到了他的一些思维方法,两年胜读十年书,也因此逐渐成熟起来。受他的影响,我在想问题、办事情、写文章时,也总是去努力追求“两个不同”:与众不同,与过去不同。这“两个不同”实际上也是我对创新的一种追求。我这本小册子里的东西,就是用这种思维方式写出来的,包括这篇不像序的“序”。

我的这本小册子,从时间上看,有一定跨度;从内容上看,职教

偏重,职教又以高职偏重,高职又以高职院校的办学偏重,同时又涉及大教育,在书名的问题上也犯了难。后来求教于出版社编辑贾平静同志,他说,根据书的内容和你的文字的特点,就叫“与时俱进论教育”吧。只是“论”有拔高之嫌,作谈论、议论解,也还可以。何况我也想不出更好的,于是就用了这个书名。在这里,我还要特别感谢小贾同志给我解了这个难题。

我的这本小册子,首先是给自己看的,因为唯恐在别人眼里是“微不足道”的,给自己看就没有这种担心了,老来翻翻,也是一种慰藉,同时也希望,让我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留下哪怕是很小很小的一点历史痕迹;其次,是给关心、爱护和欣赏我的朋友看的,获得别人的关心、爱护和欣赏,也是一种慰藉;第三是给与我有相同或相似的生活和工作经历,不一定相识的读者看的,如果能给他们一点点启示和帮助,那将是对我的最大慰藉。

段志坚

2004年12月于长沙

再版序

母爱照耀的人生

——再说说我自己和我的这本小册子

这本小册子已经出版两年了。初版时印了上千册,送朋友、送同事,今天送几本,明天送几本,就这样都送出去了。不少得到这本小册子的朋友和同事,在第二次见面时,往往要夸赞几句:“读了您的大作,受益匪浅。”“序写得好,读来有味,令人感动。”家乡的教育局长看了后,要了200本,说是要发给老师们看看。湖南农业大学科技师范学院院长要了100册,作为职教管理在读研究生的读本。有人看,有人要,说明这本小册子还有点用,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安慰,也是一种鼓励。被人赏识是一种奖励,虽然没有掌声,没有鲜花,但有一种幸福感和成就感在我心中永久地荡漾。

两年多过去了,在“与时俱进”的工作实践中又有了一些心得,做了一些课题研究,也小有成果,加上“赏识”的激励,于是有了再版的念头。我

想在再版时,把这些新的心得和成果补充进去,这样,作为个人对教育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的认识和思考的反映就会更丰满一些,作为职业生涯的一个总结也会更圆满一些,此生也不会有什么遗憾了。

初版序有个副题,叫“说说我自己和我的这本小册子”,“小册子”前面已经说过,这里我想再说说我自己。在初版序中,我只说了大学毕业后的工作经历,大学毕业前的生活和学习我也想说说,或许对我的后代以及现在的年轻人的成长,在教育学的意义上有点帮助,对我自己来说,也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人生交待。

1948年2月,我出生在湖南炎陵县(原酃县)一个山村的农民家庭。我的家距炎帝陵只有三四里路,四面环山,中间有一块盆地,我们那里叫“洞”。门前不远处有一条河,有景色宜人的田园风光。据母亲说,我出生两个月零八天,父亲就去世了。我没有得到过父爱,但享受到了天底下最博大的母爱。我有8个兄弟姊妹,3个姐姐,4个哥哥,我排行第八。解放时,我家有三亩八分地,划成分时划了个佃中农(下中农)。父亲早逝,想想在那样的年代,母亲要把8个子女抚养成人并成家立业是多么的不容易。母亲,她有十分要强的坚毅性格,有勤劳、俭朴金子一般的美德,聪慧而又善良,能干而又极富责任心。她希望她的孩子个个都有出息。要有出息就要读书。那样的家境,要送孩子读书谈何容易!但是她做到了,她创造一个8个子女没有一个文盲的奇迹!最低的读完了初小,最高的读到了大学。在我们8兄妹中,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都有。为了送孩子读书,什么苦她都能承受。她常说:“肩头顶不起,背也要顶起。”我有个舅舅在乡镇集市上做银器小手艺,家境较好,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母亲每年都要送一个孩子放在他家里吃住,还不时要到他家里去借钱借米。有一次,舅舅对母亲说:“饭都冒呷,还读什么书罗!”这本来是一句大实话,但让母亲伤透了心。因为她太要

强,太希望孩子有出息了。为了支撑这个家,她练就了一双灵巧的手。她会纺纱、纺线、会织鱼网,会酿酒(不仅会做农家米酒,还会做烧酒)、会榨米粉、会做豆腐,会做各种各样的油货,种菜、养猪、养鸡,纳鞋、缝补,几乎农村妇女会做的她样样都会。就是靠这双手换回了我们的学费,维持着家庭的生计。

过去,我们家里的晚饭一般是吃中午的剩饭,有多少吃多少,不够,母亲就不吃,让给孩子们吃,她说:“我少吃点没关系,你们正在长身体。”一年到头,我们兄妹难得添一件新衣服,要添新衣服,也是做给大的穿。老大穿不了再给老二穿,一个一个传下来,传到我这儿,已经是补丁叠补丁了。小时候,我几乎没有穿过新衣服。母亲常对我说:“穿旧点没有关系,只要不露出肉,浆洗得干净就行。”母亲打补丁很讲究,补丁布的颜色尽可能与衣服一致,针脚十分匀称。如果是一个小洞,她就要像织布那样把它织起来,不细看还看不到缝补的痕迹。她每打一个补丁,就像做一件美术作品那样认真、仔细。现在想起来,我在工作中形成的认真习惯,也不无母亲的影响。

母亲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潜移默化的。比如节俭,买东西她总喜欢拿买盐来作比较,“唉,省着点吧,买盐可以吃一个月呢。”那时一斤盐才一角七分钱,一角七分钱的零食她都舍不得给我们买。吃剩的饭菜从不倒掉,如果只剩一点点,她就一定要你吃掉。她总是说:“倒了可惜。”她吃饭还有个习惯,吃完的菜碗和自己的饭碗,还要用开水淌一淌,然后喝掉,她认为这样才一点也不浪费。在母亲的影响下,我也养成了一个习惯,剩下一点点饭菜,霸蛮也要把它吃掉。直到十几年前和教育厅的一位领导交谈,我才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你的身体需要已经满足了,再吃也是浪费,而且是有害的浪费。”特别是上了年纪,晚上多吃一点,肚子里就像翻江倒海一样,一个晚上都不得安宁。母亲的观念虽然不科学,但她的节俭精神却

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值得我们后辈永远地继承。做文字工作,经常要用纸,长期以来,我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用过了的纸,背后还能写,就存放起来,以后再用。这也是母亲给我的影响。

我的母亲从没有进过学校门坎,但她能看懂小人书。“文革”期间,还能把“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流利地背下来。她识字是我们教的。她非常好学,一有闲暇就戴上老花眼镜学起来,读小人书,读儿孙们的小学课本,遇到不认识的字就问我们,就这样积少成多,也成了一个“文化人”。村里演戏、放电影,她一场不拉。直到七八十岁,她的好学热情一点也不减。她思想进步,热心公益事业。农业合作化时期,她在村里办起了托儿所,并因此被评为郴州地区(20世纪50年代,酃县属郴州行署管辖)的劳模,出席了地区的表彰会,政府发给她的奖章,她一直像宝贝一样保存着。人民公社时期,她在家里办起了小卖部,方便周围的群众。我曾经陪教育部一位老司长出差,在车上闲谈时说起我的母亲,他感慨地说:“你的母亲真了不起,如果有人引领,她一定能成为一个革命家、政治家。”我在初版序言中曾经提到两个对我的成长和成熟起至重要作用的人,其实应该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我的母亲。是她,给了我生命,给了我智慧和力量,塑造了我的人格。可以说,母亲对我的成长起了奠基性作用。

在母亲的影响下,她的儿女们还真的“出息”了,大姐当了信用社的出纳,大哥走上了小学讲台,二哥成了团职军官,三哥进了文工团,四哥当上了生产队会计,我上了大学,当上了大学的党委书记。在今天看来,这些都算不上什么大出息,但是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山村,那样的家庭背景下,能走出这么一些人来,确实不容易。母亲为此感到十分骄傲,她成了村里最体面的人。我们也为有这样一位母亲而感到骄傲,如果不是母亲那样的含辛茹苦、省吃俭用,执著地送子女读书,我们也不会有今天的出息。现在每逢开学典礼

讲话,我都要给学生讲“感恩”:第一,要感父母之恩;第二,要感老师之恩;第三,要感社会之恩(包括党和国家)。我要同学们算一笔帐:如果单以稻谷计算,供一个学生上一年大学需要上百担谷子,一百担谷子堆起来就是一座小山;如果从襁褓里算起,那又是多少座小山呢?我让同学想想:你现在进了大学,将来还有可能当老板,赚大钱,可你的启蒙老师年复一年到现在还站在山村小学的讲台上,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有多少老师在你身上花费心血?我请同学们思考:如果不是党的政策好,国家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高校扩招,能有那么多同学特别是贫困家庭的子女有机会走进大学的殿堂吗?我认为,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便不会做人,也做不好事,更谈不上有大出息。因为,感恩是一种良知,一种道德修养,可以促人高尚;因为,感恩是一种动力的源泉,可以催人上进。这也是我的人生体验。我之所以花这样大的篇幅来写我的母亲,写她对我成长的影响,是因为在我看来这是一笔富有教育学意义的财富,我要把它留给我的后代,留给年轻人。我的母亲活到85岁,于1991年去世,如果不是到村里看戏摔折腿,躺在床上动不得,她还可以活许多年。我时时地感激她,怀念她,我是含着热泪写下上面这些文字的。我的母亲叫李寿花,我希望我的后代也能记住她——一位平凡而又伟大的母亲!

我6岁多一点发蒙,从小学读到中学,一直没有间断过。在母亲的影响下,在家我是个“听话”的孩子,在学校是个“听话”的学生。母亲要强,我也很要强,记得在初小,有次考试没拿到第一,回家就哭了。我的学习成绩算不上很优秀,但一直是优良。从小学到大学,我都是当学习委员、学习部长。我很想当班长,但当不了,因为我有“右派”大哥。我的六年中学生活都是在县一中度过的。几十个学生住一间寝室,上铺下铺,一个铺睡两个,你带盖的,我带垫的。吃的主打菜是“苦麻”叶子(与莴笋同科,叶子呈乳白色),看不

见油珠,苦涩苦涩的。自己砍柴火,两三周一次,早晨要走很远的山路,日落西山才能弄回一担柴火。高年级每年有一次集体“支农”,打着铺盖下生产队搞劳动。学校盖房子,全校总动员,捡砖头,自己动手做砖头。生活虽然苦,但也有滋有味。那时,县里教育很不发达,我读高中时,全县就一个高中班,45个学生,我们个个都算得上佼佼者。毕业那年,我们已经分了文理科准备高考,这时《评〈海瑞罢官〉》发表了,接着,省城的、京城的红卫兵来了,他们到处“点火”,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平静的山城再也不平静了。学校停课“闹革命”,有的揪斗“走资派”,有的去“串联”,我因社会关系上有“污点”,“造反派”不要我,便没有加入红卫兵组织。当时,一位副校长还没有被“打倒”,在他的支持下,我们组织了一个文艺宣传队,由我当队长,记得还有两位老师参加。我们背着背包,打着红旗,一个乡镇一个乡镇去演出。我的笔头还算可以,每到一地就收集当地的好人好事,晚上就用“三句半”表演出来,很受老百姓欢迎。大“串联”一波接一波,胆子大的同学,有的到了北京,有的去过上海。我们几个胆小怕事的同学也心动了,邀在一起,组成一个红卫兵小分队,扯起一面小旗,步行到长沙。一路上我们学习红军长征精神,还做了不少好事呢。山里伢子进城,样样都新鲜,走到韶山路上,眼睛都看大了:“哇,马路这样宽啊!”住在省机械工业学校,每天早饭都有豆腐脑汤,当时我还以为是蛋汤,心想城里的生活真不错。时值寒冬,我的手起冻疮,肿得像包子一样,又逢大“串联”的尾声,全国各地到处都在遣散红卫兵,只要你愿走,就有车子送。长这么大,我们还没有坐过汽车呢,就这样,只呆了几天,就打道回府了。此后,我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农民。

在农村的几年里,我种过田,扛过树,拖过板车。最苦最累的活要数“双抢”和砍柴火。“双抢”季节太阳最辣,田里的水滚烫滚烫的。男子汉都是打着赤膊干活,我也一样,一身晒得黑黝黝的,晒出